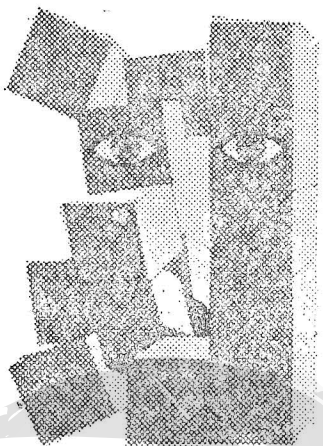


兩年來美國的反戰風暴 (上)



顏

黎

自一九六五年二月七日起，越共對美軍基地進行連續突襲，詹森總統令派第一批正式戰鬥部隊進駐越南，並開始轟炸北越軍事目標，越戰日形擴大，美國反戰份子即積極展開活動。而自去年八月三日詹森總統宣佈增加最後一批援越部隊四萬五千名，並同時向國會提出其特別加稅案之後，反戰運動乃如火燎原，風風雨雨，擾無寧日

。在此一期間，詹森總統成爲衆矢之的，所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其處境之苦，令人同情；其受屈之深，令人憤慨，而其堅持貫徹援越政策、孤軍奮鬪之精神，實已在領導自由世界反抗共黨奴役侵略史上寫下了最沉痛的一頁，是乃尤其值得吾人衷心崇敬與感念。然而美國民間的反戰運動，不僅造成了全國人心分離，整個社會動亂，更嚴重破壞了總統的權力和威信，甚至拘束了總統的言論和行動的自由。因此，這位曾於一九六四年獲得歷史上最大支持而當選的第卅五屆美國總統，終不得不於去年三月卅一日含淚宣佈放棄競選連任，並同時下令限制轟炸北越（停炸地區面積達百分之九十），以表示其和平解決越戰問題的決心，謀取國內的安定與團結。

一、反越戰的四大原因

我們分析美國民間反對越戰的原因：

第一、美軍負擔戰鬥任務過重：越南於一九五四年五月結束法國一百五十八年的殖民地統治，根據日內瓦協定，暫時南北分治。同年秋，東約組織成立，艾森豪總統即開始給予南越軍經援助。一九六一年冬，北越支持越共之內幕與證據被揭發之後，甘迺迪總統急速增加對越軍援，美軍顧問人員赴越，亦始於此時，然爲數僅六百八十五人。迨至甘迺迪被刺殞命之日，駐越美軍已達一萬六千五百名。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起，北越正規軍進入南越作戰，美軍增至二萬三千人。一九六五年春，越戰擴大，美軍於六月開始正式執行戰鬥任務，自此援軍絡繹不絕於途，截至去年八月，美軍援越部隊已達五十四萬三千之家，比起十四年前韓戰美軍人數尚超過六萬零二百名。越南各個戰場，歷次戰役，全由美軍擔負主要戰鬥任務。此外，駐泰美軍四萬六千人，以及日常巡航於南中國海面之第七艦隊三萬多海軍

人員，尚須從事支援對越戰任務。根據國防部公佈，自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止，美軍在越戰中損失飛機一千八百六十一架，而至去年八月廿一日止，美軍已有二萬六千九百零三人死亡，十五萬餘人受傷，傷亡數字，已列為美國立國以來歷次流血戰爭中傷亡最大之第四位。在美國人看來，越南戰爭已完全變成美國戰爭了。

第二、越戰軍事消費浩大：美國聯邦政府一九六八會計年度至去年六月終止，共計開支一千七百八十九億元，除收入一千五百卅五億元外，差額達二百五十四億之多。在全年國防費用七百七十八億元中，越戰預算原定為二百零三億，但自去年二月起，由於越共發動全面性瘋狂突襲，美軍費用激增，越戰全年開支，遠已超出原定預算，達到二百卅四億元。本會計年度總預算經國會削減之後為一千八百零一億元，其中越戰軍費預定為二百五十億元，佔全年度總預算百分之十四。換言之，美國以現有兵力在越作戰，平均每天須消費七千七百萬美元。美國自一七七六年立國以來，原以一九四四年國防預算為最龐大，其時二次世界大戰進入高潮，美國武裝軍事人員達一千一百四十五萬之眾；今天美國三軍人員僅三百五十四萬三千，但國防預算已超過一九四四年，由此可見越戰負擔之重大。詹森總統之特別加稅案雖已經國會於去年六月二十日通過，但據估計，本年度預算差額，仍將接近一百億元。預算無法平衡，物價日趨高漲，人民厭戰，固為情理之常。

第三、都市黑人暴動，犯罪激增：美國於前

年十一月廿日到達兩億人口，全年國民所得已超過八千五百億元，平均兩個多人有一座電視，百分之七十九以上的家庭有一輛或二輛以上的轎車（美國家庭平均人數為三點七一人），擁有一億以至數億元財產的巨富有五百五十三人，國家之富強，生活之優越，為人類史上所僅見。然而美國畢竟還有不少「窮人」，根據社會安全行政處（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評定，凡四口之家，每年收入在三千三百卅五元以下者，列為「窮人」。依照此一標準，美國一億七千五百萬白人中，有百分之十一點九列為「窮人」；在二千五百萬「非白人」中（黑人、印第安人以及亞洲各國移民），列入「窮人」者有百分之四十點六，其中十分之九以上為黑人。

黑人生殖率最大，一九一〇年時，美國黑人為數尚僅九百八十萬，但至一九六六年即已增加一倍以上，達到二千一百五十萬人，與白人成八與一之比，其中百分之七十居於全美十二大都市之內。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七日，美國最高法院在「布朗與教育局」(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爭訟一案中，推翻了「黑白分離而平等」的定讞，判決公立學校「黑白分離」政策為非法。此一判決對美國社會具有劃時代性的重大影響，自此黑人民權運動，急速發展，政府對黑人地位，亦繼續盡力予以提高，而在詹森總統任期之內，更通過重大民權法案多起，如投票及房屋買賣租賃權等法案，皆其最著者。近兩年來，由於民權迅速提高，黑人「反貧窮」運動接踵而起，而極端份子，更進以爭取「黑人

權力」(Black power) 為號召，公開呼籲以暴力為手段，向白人進行奪權鬥爭。由於反貧爭權運動之影響，少數黑人每於溽暑苦人之際，在街頭製造事端，終至引起大的暴動。以前年為例，從一月至九月，全美一百廿八個大小城市共發生暴動一百六十四起，其中最嚴重者有八，如地峴羅(Detroit)一處暴動，計有四十一人死亡，一千三百棟房屋被縱火焚燒，二千七百家商店遭受搶劫或搗毀，其情況之嚴重，已使整個社會動搖。去年四月五日黑人領袖金恩(Martin Luther King)被刺死之後，黑人懷恨在心，趁機搗亂，全美又有一百廿五個城鎮發生暴動，首都華府，亦難倖免。此番共計卅九人死亡，三千五百人受傷，因縱火、搶劫或搗毀所導致之財物損失，達四千五百萬元。

至於社會犯罪問題之嚴重，過去七年來，美國人口增加百分之十，但犯罪事件增加百分之八十八，去年犯罪事件已是九倍於人口增加速度，去年一月至三月，犯罪事件更比前年同一時期增加百分之十七。究其原因固多，但主要為美國各級法院量刑過輕，即屠殺全家老少之首惡元兇，亦能免於一死。聯邦法院自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五日判處一人死刑之後，迄無死刑之執行；美國三十七州法律雖尚有死刑之規定，但形同虛設，過去多年來只有三人處死。而美國槍枝自由買賣，人民私藏長槍、手槍甚至機槍，為數多至五千萬到兩億枝之間，更導致違法犯罪案件之增加。美國立國一百九十三年來，軍人死亡於國內外歷次戰役者，至前年六月中止，總計不過六十三萬七

百六十八人，但自本世紀開始，六十多年來，美國人民死於私人槍殺事件者接近八十萬人之多（包括以槍自殺及意外槍禍死亡）。根據詹森總統前年六月廿四日之報告，持槍行兇事件，一九六六年計四萬三千起，去年增至五萬五千起；持槍搶劫事件，一九六六年計六萬起，前年增至七萬一千起；而槍殺死亡人數，一九六六年為六千五百人，前年已增至七千七百人。其他為強姦盜竊犯罪事件，更是日有所聞。在此種暴動與犯罪激增，社會秩序動亂不安的情況下，一般人愈認詹森總統之「槍桿」與「牛油」政策（指對付越戰及國內社會問題），不可並行；而左派及極端份子，則認為政府將億萬美元「浪費」於「與美國無關」的萬里以外的越南戰場，「置國內民生問題於度外」，並視黑人暴動為「應有」之行爲，更是盲動和失策。（筆者註：詹森總統對「反貧窮」所採取之一切措施而開支之經費，一九六八年計年度多達二百四十六億元，一九六九年為二百七十七億元，其對民生問題之重視與努力，於此可見。）實爲本末倒置觀點錯誤。

第四，失敗主義作祟：當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美國務院公布北越支援越共之證據時，越共武力爲正規軍九千名，非正規軍八千名，其力量實微不足道。但至去年六月廿四日止，越共（包括北越部隊）死亡人數已達三十六萬四千一百五十四人之多，而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越共尙維持到十一萬五千人；前年六月廿五日，根據西貢美國軍方之報導，在南越地區之越共及北越部隊已增到三十萬人。由此可見敵人力量係日在擴

大之中。尤其是前年二月二日越共開始發動全面性的猛烈突襲以後，南越二十六個省會以及無數縣鎮同時遭受嚴重打擊與破壞，首都西貢及故都順化，亦不能倖免，甚至連美國大使館亦爲越共自殺隊進擾，無法確保其安全。而南越除本身七十七萬五千部隊及韓、菲、泰、澳、紐五國聯軍六萬三千人（內韓國佔四萬八千）之外，加上美國五十多萬堅強部隊及最優越之空軍與最新式武器，尙難爭取主動，擊潰敵人，在失敗主義份子看來，美國已無法贏取越戰；而善後之計，唯有和平談判解決之一途。

一、國會對越南政策的「變心時期」

美國民族性反戰，在歷史上八次戰爭中，除了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韓戰以外，如獨立戰爭（一七七五—一七八三）、對英戰爭（一八一—一八一八）、對墨西哥戰爭（一八四六—一八四八）、南北戰爭（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對西班牙戰爭（一八九八），人民反戰情形都很激烈，其中尤以南北戰爭爲最，當時人民四處暴動，軍人公開通敵，國會絕大多數議員對林肯總統群起攻擊，終使全國人心分崩離析，幾至無法收拾。一八六四年六月，當南北戰爭進入高潮之際，駐於南部俄亥俄等三州地區之聯邦政府軍指揮官白望塞(Ambrose Burnside)將軍下令所屬部隊：「凡公開表示同情敵人之行徑，今後將不再予容忍。」此令一出，國會議員華蘭利姆(Clement Vallandigham, 一八二〇—一八七一)起而反對，並發表其有名的攻擊林肯演講

詞，其中有云：「林肯王：戰敗、負債、加稅、立塚——這些都是你的優勝獎品。」(King Lincoln: defeat, debt, taxation, sepulchers—there are your trophies.)，其反戰言論之激烈，無以復加。

然而，詹森總統面對的第九十屆國會，較之林肯時的第廿八屆國會，反戰情形之嚴重，實可同日而語。

美國第九十屆國會，保守派議員人數原屬不少，在參議院一百人中；保守派佔百分之卅九點八；在眾議院四百卅五人中，保守派佔百分之四十八點四。但就對越政策而言，反對人數比例甚大。根據白宮人員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私下分析統計，國會公開採取「主和派」(Doves)，(批評現行對越政策，主張減少軍事行動，進行和談，以解決越南問題者，包括主張完全停炸，美軍撤退，承認越共參加聯合政府組織之妥協份子)立場者，參議員接近三十人，眾議員約在五十人左右。但至前年二月十二日，根據紐約時報分析，由於越共發動瘋狂突襲之影響，參議員中「主和派」增至四十一人，其中廿五人爲積極「主和派」。「主戰派」(Hawks)——支持現行對越政策，反對與共黨妥協者，(包括主張加強軍事必要措施，以爭取越戰勝利。)計卅六人，傾向於「主戰派」立場者計廿三人。在眾議院方面，眾議員簽名提議要求國會對越南政策重新檢討，並呼籲和談，甚至給予越共以參加南越政府組織之權利，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廿五日發動時爲五十二人，但至前年三月十八日，眾議員連署人數，已增加到一

百卅九名之多。

參議員中反對詹森政策最為激烈而影響最大者，全為民主黨員。以弗爾布萊特為首的外交委員會，是首豎起反戰旗幟的領導中心；羅伯甘迺迪是反戰實力派的最高領袖，他雖不幸死於非命，但其力量與影響依然存在，麥克構芬遲遲於八月十日宣佈參加競選，其目的即在「繼承」羅伯甘迺迪之「衣鉢」以擴大其反戰的政治影響，麥下錫為反戰而首先參加總統競選，成為名噪一時的「和平候選人」，此皆其著者。而自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詹森總統增派援軍，提請加稅之後，國會同黨議員，即過去反共意志堅決，全力支持政府對越政策者，亦紛紛變志，轉而呼籲停炸和談，此即所謂「國會變心時期」(Congressional mind-changing period)。議院民主黨重要議員阿尼爾(Thomas O'Neill)原是一貫支持詹森政策的，一九六六年九月他改變立場。眾議員猶多(Morris Udall)，一九六五年尚竭力為政府辯護，翌年十月廿二日却公開承認「我堅決相信今天詹森總統的顧問們是錯誤的。」眾議員芬德勒(Paul Findley)原是共和黨的保守派，一九六六年二月在伊利諾州議會上演說時，尙強調「越南戰爭是一個反奴役的戰爭，不容妥協」，到了九月，他就一反前調，自認「我的看法變了……：今我們的工作是尋求一條退出越南而不太丟臉的途徑。」而最出人意外的莫過於共和黨參議員莫頓(Thurston Morton)，莫頓原為艾森豪總統主政時之助理國務卿及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在參議院中為一反共最力而又具有高度影響力之

議員，一九六六年八月底他回到家鄉肯塔基州，回到華府之後，即透露其立場之變易，他說「我原是一個十足的『主戰者』，完全支持轟炸北越。我以為只要轟炸一經開始，戰爭將會在半年內結束，結果我是錯。」(I was an all-out hawk. I was all for the bombing; I thought once we started, the war would be over in six months. I was wrong.)

國會為代表民意最高權力機構，議員們的反戰言論不僅直接鼓勵了民間的反戰行動，更助長了敵人的侵略氣焰和進行戰爭到底的決心，北越國防部長一九六六年十月初即會公開宣稱，美國反戰份子是對他們代表「一個富有價值的同情的標誌」，仇者快的情形，於此可以想見，無怪乎國會眾議院院長麥柯麥克(John McCormack)在前年十月十一日院會上一次演說，痛憤陳詞，拍桌指摘議員的反戰言論是一種「安慰敵人」的行為，他說：「如果我是他們這樣批評的一份子，的話，在我有生之年，我的良心將會受到譴責。」(If I were one of those making such criticism, my conscience would disturb me the rest of my life.)

在參議院卅六名共和黨參議員中，除了古柏(John Cooper)，艾肯(George Aiken)，哲斐芝(Jacob Javits)，凱斯(Clifford Case)，赫特斐爾(Mark Hatfield)，拍西(Charles Percy)及莫頓等人為「主和派」之外，其餘絕大多數為支持對越政策者，如寶克遜(Everett Dirksen)，希肯洛普(Bourke

Hickenlooper)，蒙特(Karl Mundt)，霍契爾(Thomas Kuchel)，陶爾(John Tower)，塞爾蒙(Strom Thurmond)，墨斐(George Murphy)，柏克(Howard Baker)，多米尼克(Peter Dominick)等，都是對共黨及遠東問題認識深切的人士，他們了解越戰是共產集團擴張侵略行動之一部，不僅關係整個亞洲的前途，也影響到美國本身的安全，因此在越戰中不能妥協。詹森之對越政策，得力於他們的一貫支持，尤其寶克遜身為參議院共和黨領袖，在反戰呼聲中，常挺身而出，為詹森政策辯護，寶克遜和詹森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兩年間，分別為參議院中兩黨領袖，雖立場不同，私情却極融洽，詹森就任總統之後，其政策往往為國會本黨領袖所反對，却為反對黨領袖所極力支持，實為政壇少見的現象。有一次記者問寶克遜：「你和總統一天通過多少次數電話？」他回答說：「有時一天之內，我們通電話六七次，不是我打給他，就是他打給我。」由此可見他和總統關係之密切了。就是基於此一原因，部份共和黨人士曾予非議，認為大選時，寶氏如此支持詹森政策，可能影響到反對黨的立場和利益。為此，寶氏曾於前年十二月五日在記者會上引用兩句歷史名言，以為駁斥：「並非吾愛凱撒之薄，實由吾愛羅馬之厚。」(Not that I love Caesar less, but that I love Rome more.) 他說他一生身為共和黨員，竭力維護本黨，但以國家利益為至上，由此可見其支持對越政策，是完全出於愛國之一念了。